

汉代巴蜀经学述论

舒大刚¹, 吴龙灿²

(1.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成都 610064; 2. 宜宾学院 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 四川 宜宾 644000)

摘要: 汉代巴蜀经学兴起于文景之世, 文翁奖励儒学教育, 领先全国以“七经”造士, 于是七经之学盛行巴蜀, 经学人才辈出。两汉巴蜀经学以易学、小学最盛, 《诗》、《书》之学次之, 而《礼》、《春秋》、《孝经》、《论语》之学亦有可观。巴蜀学者不满当时章句之儒“碎义逃难”、“违背孔真”的现象, 自严遵始融《易》《老》于一炉, 扬雄创拟经新篇, 从而构成汉代巴蜀经学独辟蹊径、自成体系之特色。汉末巴蜀经学与巴蜀地域政治经济命运密切相关, 今古兼治, 扬马击郑, 于是以杨门之学和谯氏之学为代表的通经致用之学和讖纬学大兴。

关键词: 蜀学; 经学; 巴蜀; 汉代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15(2013)06-0005-09

巴蜀大地, 自古就是人文荟萃的地方, 学术文化几乎与中原同步孕育、并行发展。然而由于巴蜀地界西南边陲, 俗杂蛮夷之风, 习尚异类之学, 故时至战国及汉初, 或被中原人士视为“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1]卷五《秦策三》, 或称其“有蛮夷风”, “好文讥刺”^[2]卷八十九《循吏传》, 卷二十八《地理志》, 或又称“蜀椎髻左言, 不晓文字”^[3]《蜀王本纪》, 243-244, 似乎与中原礼义之邦有着相当的距离。但是种种迹象表明, 巴蜀不仅有其自身的文化发展序列, 也与中原地区有着较早的学术文化交流。特别是经西汉景帝时期文翁建立学宫于成都市中, 引进儒家“七经”教育以后, 巴蜀的学术文化便迅速与中原合流, 有“蜀学比于齐鲁”^[4]卷三十八《蜀书·秦宓传》和“巴蜀与齐鲁同风”的说法, 俨然是儒学文化的又一传播和弘扬基地。本文拟以两汉时期经学为背景, 略探巴蜀学人在儒家经典传

授领域的所作所为及其成就。

一 汉代巴蜀经学渊源略说

汉代巴蜀经学之渊源, 最可信据者, 为《汉书·循吏传》所记“文翁化蜀”史迹, 以为“至今巴蜀好文雅, 文翁之化也”^[2]卷八十九《循吏传》。“文翁, 庐江舒人也。少好学, 通《春秋》, 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 为蜀郡守, 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 文翁欲诱进之, 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飭厉, 遣诣京师, 受业博士, 或学律令”^[2]卷八十九《循吏传》。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前, 汉承秦制, 博士所教六艺百家皆备。文翁为奖励学习, 采取了很多优惠助学政策: “减省少府用度, 买刀布蜀物, 赍计吏以遗博士。”^[2]卷八十九《循吏传》。学员学成归蜀, 都有重用, 并立地方官学, 就学者减免税赋, 学有所成者起用, 于是上学成了蜀地荣幸, 蜀学大兴。“数

收稿日期: 2012-11-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10@ZH005)“巴蜀全书”, 四川省社科基金规划项目(SC12E001)、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儒学研究中心重点项目(RX12ZD02)“中国儒学文献通史”,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儒学研究中心重点项目(RX13ZD02)“汉魏经学传承与文献考述”。

作者简介: 舒大刚(1959—), 男, 重庆秀山人, 历史学博士,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儒藏》主编、《巴蜀全书》总编纂, 主要从事儒学、历史文献学等研究;

吴龙灿(1969—), 男, 浙江永嘉人, 哲学博士,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 宜宾学院思想家研究中心讲师, 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经学、中国哲学、政治哲学等研究。

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2]卷八十九《循吏传》}。后来武帝立学,于文翁亦有取法:“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2]卷八十九《循吏传》}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也有类似记载:“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是时世平道治,民物阜康,承秦之后,学校陵夷,俗好文刻。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因翁倡其教,蜀为之始也。”^{[5]卷三《蜀志》}文翁立教,是以儒家《七经》(即《诗》、《书》、《礼》、《易》、《春秋》、《孝经》、《论语》)为主体的经学教育,直接启导了汉代巴蜀经学发展。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成都“孔子庙”条云:“昔司马相如教授于此。”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一“石室”条引《寰宇记》云:“石室,司马相如教授于此,从者数千人。”^{[6]卷一}可见规模之大,从学之众。清嘉庆《邛州直隶州志》卷三十四《人物志》载:“胡安,旧志临邛人,聚徒教授白鹤山点易洞,先生明天文历象阴阳之数,司马相如从学焉。后乘鹤仙去。”祝穆《方輿胜览》卷五六亦载:“白鹤山,在城西八里。常璩曰:临邛名山曰四明,亦曰群羊,即今白鹤也。汉胡安尝于山中乘白鹤仙去,弟子即其处为白鹤台。”《蜀中广记》卷七四引此文,未有“司马相如从胡安先生授《易》于此”^{[6]卷七四}句。又卷一三引《益都耆旧传》:“胡安,临邛人,聚徒于白鹤山,司马相如从之受经。此县又有林间,善博学,自古天子有轺车之使,惟间与严君平知之,为扬雄所师。”^{[6]卷一三}司马相如为学成名在文、景之间,早于文翁之倡教立学,其学受之胡安。

魏了翁《邛州新创南楼记》又记蜀中人物之盛曰:“临邛居蜀上游,鹤山襟其西,邛水带其南,风气融液,土田衍沃。民生其间,检履醇固,习尚儒雅,盖自胡安先生、林间翁孺,尝为汉卿、云从之受业,卒以名世。庄遵、陈立,嗣有显问,风流所渐,代不乏

贤。”^{[7]卷三九}又《大邑县学振文堂记》:“吾州之俗,检履醇固,而被服文雅。盖自汉以来,代有显人,胡安先生、林翁孺、庄君平,以经授长卿、子云,流风所渐,儒学日茂。”^{[7]卷四〇}若《寰宇记》、魏了翁、《方輿胜览》等所言可靠,则蜀学倡教不得自文翁始,因为早在文景时期已有胡安在蜀中传经矣。然而,成巴蜀教化规模而为天下模范者当为文翁。文翁与胡安可谓两汉巴蜀经学教育之先驱。

《汉书·地理志》:“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其迹,后有王褒、严遵之徒,文章冠天下。由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故孔子曰:‘有教无类。’”^{[2]卷二十八《地理志》}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故司马相如耀文上京,扬子云(雄)齐圣广渊,严君平(遵)经德秉哲,王子渊(褒)才高名隽,李仲元(弘)湛然岳立,林公孺训诂玄远,何君公(武)谟明弼谐,王延世著勋河平,斯盖华岷之灵标,江汉之精华也。”^{[5]卷三《蜀志》}此八人乃为世所称的蜀学、事功之代表人物。宋田况《进士题名记》:“蜀自西汉,教化流而文雅盛。相如追肩屈、宋,扬雄参驾孟、荀,其辞其道,皆为天下之所宗式。故学者相继,谓与齐鲁同俗。”^{[8]卷三〇}皆称汉代蜀学盛况。

清顾藹吉《隶辨》卷七“石室壁间题字”,从文翁当年所派学于京师的张叔之孙张景的题字中,发现称赞张叔“以《诗》《书》发,〔遗〕京师,受业《春秋》,〔学非〕仲舒,智非胡母”^{[9]卷七},“道为国师,出典方州,忠著金石”^{[9]卷七}。又说叔之子弘农太守张子阳,“著德义方,袭父经业,《春秋》《尚书》,海内归高”^{[9]卷七}。可见张叔不仅自己是有成就的名儒名宦,而且其儿子张子阳、孙子张景都极有造诣,堪称汉代巴蜀第一“经学世家”。

又据《隶续》“高朕石室六题名”跋云:“此(文翁)石室亦如李刚鲁恭武氏石室,壁间皆刻古圣贤画像,题识姓名。”^[10]其中有“扬子云、司马相如”,可见二人也加入了“画像上题识”的行列。《隶释》卷一四又有《学师宋恩等题名》,“在成都周公礼殿门之西序,蜀人谓之学师题名”。题名中“其称师者二十人,史二人,孝义掾、业掾各一人,易掾二人,易师三人,尚书掾、尚书师各三人,诗掾四人,春秋掾、议掾、文学、孝掾、文学掾各一人,文学师四人,从掾位及集曹、法曹、贼曹、辞曹、史又三十二人。其漫灭

不可辨者十三人。汉永平中尝为四姓小侯立学,置五经师,此则蜀郡诸生也。当是郡守兴崇学校者镌石纪德,诸生既刻姓名,而诸曹史亦缀其末。”^{[10]卷一四}该书作者又说:“成都又有左、右生题名一巨碑,盖左学、右学诸生也。”^{[10]卷一四}于此可见当时巴蜀学校规模建制,蜀郡不仅有专门的学校(始建于文翁的石室)教授儒家“七经”,而且有专门的教师(易掾、书掾、诗掾、孝掾、春秋掾以及其他管理人员)传道授业,还有区别生徒类型和等级的左学、右学,其学校“壁间皆刻古圣贤画像”^{[10]卷一四},诚卓然大观,领先中土。

下面分类论述汉代巴蜀经学之源流和成绩。

二 一枝独秀的巴蜀易学

《易》学在巴蜀的传播,渊源有自,从传授时间上考察似不迟于中朝。商瞿《史记》作鲁人,但汉文翁石室“壁间所刻古圣贤画像”其名乃为“商瞿上”,杨慎据宋人的说法认为是瞿上乡(在四川双流牧马山一带)人。由于资料缺乏,此处不予讨论。如果从两汉《易》学文献来考察,巴蜀易学是非常久远的^①。前引汉初胡安居邛州白鹤山传《易》,司马相如曾从之学《易》^{[6]卷一四}。宋人魏了翁《邛州白鹤山营造记》就说:“(邛)州之西直治城十里所,有山曰白鹤,……远有胡安先生授《易》之洞,近有常公谏议读书之庵。”^{[7]卷五〇}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在文帝景帝时已经知名,他向胡安学习《易经》,应该是青年时期的事情,最迟也应在文帝末年(前157)或以前。中原的田何传授《易》学,大约在惠帝时,《高士传》曾说“惠帝亲幸其庐以受业”,当与胡安是同一时代人。田何传《易》于中原,胡安也在巴蜀传授《易》学,二人也许稍有前后,但相去不远。司马相如生活的时代应该和《易》学博士杨何同时,他在《上林赋》中说“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述《易》道”^{[11]卷二《上林赋》}云云,表明他为学比较关注“《礼》苑”、“《书》圃”和“《易》道”,史志说他曾经跟从胡安学《易》是有根据的。

巴蜀稍为晚一点的《易》传人赵宾,文献显示他曾经为中原易家孟喜的老师。《汉书·儒林传》载:“蜀人赵宾好小数书,后为《易》,饰《易》文,以为‘箕子明夷,阴阳气亡箕子。箕子者,万物方蓂兹也。’宾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难,皆曰非古法也。云受(授—引者注)孟喜,喜为名(称扬—引者注)之。后宾死,莫能持其说,喜因不肯仞(承认—引者

注),以此不见信(伸—引者注)。……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2]卷八十八《儒林传》}赵宾既然曾经传《易》学之术于孟喜,他在世的时间就应与丁宽同时,约在汉景帝之时。可惜,赵宾除留下用“蓂兹”解《易》“箕子”遗说外,再无其他学说可考。

再晚有严君平,他名遵字君平,是汉宣帝、元帝、成帝时人,史家说他“卜筮于成都市,以为卜筮者贱业,而可以惠众。人有邪恶非正之问,则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执导之以善,从吾言者已过半矣”^{[2]卷七二《王贡两龚鲍传》}。又说他“雅性澹泊,学业加妙,专精《大易》,耽于《老》《庄》”^{[5]卷一〇上}。宋郑樵《通志·艺文略》“五行家”的“易占类”著录有《周易骨髓诀》一卷,注曰“严遵撰”;《宋史·艺文志》“筮龟类”有《严遵卦法》一卷。二书虽然不见于汉唐人的著录,疑为后世依托,但颇得严遵易学特征。

巴蜀《易》学的特色以象数、卜筮为主。赵宾授《易》孟喜,对今文《易》象数派的“孟京”有影响。此外,胡安有仙气,严遵以卜尊,后之扬雄兼师二法。魏了翁说“远有胡安先生授《易》之洞”^{[5]卷五〇《邛州白鹤山营造记》},胡安居洞授《易》,临台升仙,可见他是修道成仙之人,当是仙道之流。严遵以卜筮劝善,兼道家、数术二术。其书之传世者有《道德指归》,最大特色就是融合《易》《老》,沟通儒道。书仿《周易》六十四卦上下经例,将《老子》分为七十二篇、上下二篇,《说目》曰:“昔者《老子》之作也,变化所由,道德为母,效经列首,天地为象,上经配天,下经配地。阴道八,阳道九,以阴行阳,故七十有二首。以阳行阴,故分为上下。以五行八,故上经四十而更始。以四行八,故下经三十有二而终矣。”^{[12]卷首《说目》}严氏《得一篇》又说:“然《大易》乾乾光耀,万物资始,云蒸雨施,品物流行。元首性命,玄玄苍苍,无不尽覆。”^{[12]卷一《得一篇》}史所谓其“专精《大易》,耽于《老》《庄》”,诚非虚语。世谓《连山》占用“七八”,《周易》占用“九六”。扬雄少时即从君平游学,仿《易经》作《太玄》,成一代拟《易》先锋,张行成说扬雄《太玄》“义取于《连山》”^②,当是赵宾、君平所传。

四库馆臣述《易》学变迁说:“《易》本卜筮之书”,“《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襍祥;再变

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13]卷一胡安、严遵《易》学,尚近于《左传》。赵宾之法,则远启孟、京,为襍祥《易》学鼻祖。学人曾经分析汉代《易》学为四派:“训诂举大义,周、服是也”;“阴阳灾变,孟、京是也”;“章句师法,施、孟、梁丘、京,博士之学是也”;“彖、象释经,费、高是也”^[14]。放之蜀中,严遵颇近周、服;扬雄《太玄》似费、高;赵宾实启孟、京。至于讲究“章句师法”的博士《易》,本为蜀人所不喜(如李弘、扬雄),但史说“蜀之学于京师者比齐鲁”,传其术者当不乏其人。宣帝时,郫县人何武与成都人杨覆众等因歌王褒《中和颂》,赢得宣帝奖励,于是“武诣博士受业治《易》,以射策甲科为郎”^[2]卷八十六《何武传》,所传无疑就是博士《易》学。

东汉时期的太学仍然信守西京的施、孟、梁丘、京氏之传,蜀人受学,师法也多是博士《易》。《后汉书》记谯玄、谯瑛世传《易》,玄在西汉哀帝、平帝时期,瑛为东汉章帝的师傅,家自为学。又《杨由传》载:“杨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少习《易》,并七政元气、风云占候,为郡文学掾。”^[15]卷八十二上《杨由传》《段翳传》载:“段翳字符章,广汉新都人。习《易经》,明风角,时有就其学者,虽未至,必豫知其姓名。”^[15]卷八十二上《段翳传》《华阳国志》又载郫县(今三台)人冯颢,少年曾跟从成都杨班、张公超及东平人虞叔雅学习,后来“作《易章句》及《刺奢说》,修黄老,恬然终日”^[5]卷一〇中。杨、段尚占,冯颢则崇黄老,自然是严遵一路风格,可见是巴蜀《易》学的本来特色。

《后汉书》又载任安受《孟氏易》,折象通《京氏易》,景鸾治《施氏易》,作《易》说^③。《华阳国志》卷一一又说成都任熙通《京易》,都是师法博士《易》。这些记载说明东汉巴蜀《易》学传授,在本土特色外,还有势力强大的中原官学博士易。

东汉时期,古文经学经过郑众、贾逵、马融、许慎等人努力,已经取得很大成就;郑玄又兼治今古,遍注群经,开辟经学“郑学”时代。可是这些学术形势,似乎对蜀中影响不大。及至三国时期,刘表在荆州设立学宫,表彰古文经学,搞经学的司马徽、宋衷,搞文学的王粲、王凯等,皆活跃于这里,在经学上都与郑学对抗。梓潼的尹默、李仁自感“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知其不博”,于是二人“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名徽)、宋仲子(名衷)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这样一来古文经学才传入蜀中。李仁

的儿子李譔,俱传本家之学,后从尹默“讲论义理,五经诸子,无不该览加博”,曾做过蜀汉后主太子的师傅。李譔“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是巴蜀首批古文经学著作。史家说他的书“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4]卷四十二《蜀书》,是比较纯粹的古文成果。

巴蜀学人多隐士,他们学习《易经》多在于应用和卜筮,不在意著作,即使著述了也不在于炫世,故文献传者不多。宋代青阳梦炎说:“蜀在天一方,士当盛时,安于山林,唯穷经是务,皓首不辍。故其著述往往深得经意,然不轻于自炫,而人莫之知。书之藏于家者,又以国难而毁,良可慨叹!”^[16]卷首他说的虽然是南宋情况,但是对于整个巴蜀历史来讲也未尝不是如此。直到东汉时,巴蜀《易》学传授与博士《易》、古文《易》相结合,才产生了一批《易》学名著,正如前述景鸾“易说”、冯颢《易章句》、李譔《古文易指归》^④等文献,这些似乎是巴蜀《易》学的首批成果。至于三国时郫(三台)人王长文,又远承扬雄的故智造起“易经”来。他是蜀汉犍为太守王颀的儿子,曾经依仿《周易》创作《通玄经》四篇,其书有《文言》、《卦象》等篇,可以用来卜筮,当时的人比之于扬雄《太玄》。从此之后,巴蜀《易》学代代都有传人,而且越传越显,至宋代便有程颐“易学在蜀”的话,不过那是后话了。

三 渊源有自的《诗》《书》之学

司马相如《封禅文》云:“《书》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谈,君莫盛于唐尧,臣莫贤于后稷。”^[11]所引即《益稷》。文翁遣张叔等入京从博士受“七经”,还教吏民,《尚书》即在其中,此时的《尚书》之学皆今文。

及至东汉,巴蜀治《尚书》学的人物有三位:张楷、杨统、何随。

据《后汉书》本传载,张楷字公超,成都人,为汉和帝时郡守、司隶校尉张霸中子,“通《严氏春秋》、《古文尚书》”^[15]卷三十六。《严氏春秋》为《公羊》学,自是今文;《尚书》却是古文学。《后汉书》说他父亲张霸“从樊儵受《严氏公羊春秋》,遂博览‘五经’”^[15]卷三十六,是公超之学亦得于家传。公超不乐仕进,隐居弘农山中,学者随之,所居成市,华阴遂有“公超市”,五府连辟,举贤良方正,皆不就。桓帝时“坐系廷尉诏狱,积二年,恒讽诵经籍,作《尚书注》”^[15]卷三十六。公超所作《古文尚书注》是巴蜀第一

部《书》学著作,考其时代,略迟于马融,稍早于郑玄,在中国《古文尚书》学史上应有一席之地。

杨统家居新都,五世皆传《夏侯尚书》(见前引《益部耆旧传》)。何随字季业,蜀郡郫人,汉司空何武之后,“治《韩诗》、《欧阳尚书》”。蜀汉时因“世有名德,征聘入官”;入晋不仕,“居贫固俭,衣弊蔬食,昼躬耕耨,夕修讲讽”,“目不视色,口不语利。著《谭言》十篇,论道德仁让”^{[5]卷一}。杨、何两家皆今文学。特别是何随,其祖武乃为汉宣帝唱王褒《中和颂》、留从博士习《易》者,自西汉中期至魏晋时期垂三百年,家学不衰,亦可谓能世其家学矣!此外,吴福连《拟四川艺文志》又考知“汉有王涣、李譔、谯岍,晋又有常宽、常勛、陈寿,皆通《尚书》”^[17],则《尚书》之学,不替其传矣!

西汉时期,《诗》亦传入巴蜀,文翁石室所授“七经”之中即有《诗经》,唯不详所传何家之《诗》。考司马相如《美人赋》,有所谓“途出郑卫,道由《桑中》,朝发《溱洧》,暮宿‘上宫’”(《古文苑》卷三)之辞,郑、卫即《诗经》十五《国风》之一,《桑中》、《溱洧》又为鄘、郑之诗,“上宫”乃《桑中》所约之处……一篇《美人赋》,俨然在作《诗经》郑、卫之旅!自非熟于《诗》者所不能为。

东汉至于魏晋,四家《诗》并传于时。据吴福连《拟四川艺文志》考证:当时“习《鲁诗》者李业,习《齐诗》者任末、景鸾,习《韩诗》者杜抚、杨仁、杜琼、何随。三家之学,不绝于蜀矣”^[17]。然而这只是博士《诗》学的情况,与中原一样,民间学人之专攻,则以《毛诗》为盛。吴氏又说:“而其时习《毛诗》者,倍多于三家,故《毛诗》最显于时。若文立、司马胜之、常勛、王化、李譔、任熙、常骞、常宽,皆常璩所称治《毛诗》者也。”^[17]

巴蜀专著性《诗》学文献,到了东汉才见著录。《后汉书·景鸾传》载:鸾“能理《齐诗》”,“作……《诗》解”,“名为《交集》”^{[15]卷七十九下}。又《后汉书·杜抚传》载,抚犍为武阳(今彭州)人,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后归乡里,教授弟子千余人,“所作《诗题约义通》,学者传之,曰‘杜君法’”^{[15]卷七十九下}。《三国志·蜀书》又载,传任安之术的“〔杜〕琼,年八十,延熙十三年(250)卒,著《韩诗章句》十余万言”^[4]。又载,李譔传其父仁、师尹默所得荆州古学,“著古文……《毛诗》……指归”^[4],又说其旨与王肃所著书合,显然与《郑笺》立异。据上所引,景

鸾有《齐诗彙集》;杜抚定《韩诗章句》,撰《诗题约义通》;杜琼著《韩诗章句》10余万言;李譔撰《毛诗指归》。终两汉三国之世,蜀中《诗》学文献,其可考者仅此5种而已,今并皆不传。自东汉末年郑玄据《毛诗》作《笺》,三家《诗》遂废,经学形成“郑学”时代。而蜀人杜琼犹在蜀汉时为《韩诗》作10余万字的《章句》,李譔又以贾马之学以驳郑,是皆不屑作人云亦云、随风而靡之学者。

四 胜义迭出的《礼》《春秋》《孝经》《论语》之学

蜀人之治《礼》,不主文献纂述,而在于日用常行。考诸嘉庆《四川通志》和《清代蜀人著述总目》,巴蜀古今《礼》学文献,汉有3种,唐1种,宋16种,元7种,明10种,清代30余种,总计50余种。数量虽然不多,而特色却很鲜明。据吴福连《拟四川艺文志》考证说:“蜀之制《封禅书》者,前有相如,后有杨终,典礼莫重于此也。《范史》称,犍为董钧习《庆氏礼》,永平中(东汉明帝年号,公元58-75年)草创礼制,多用其议,其《礼》学之名与?《华阳国志》说李譔、常宽、文立、司马胜之、王化、常骞,皆治‘三礼’,而《礼》之传益广矣!”^[17]这是两汉三国蜀人《礼》学传授的情况,可谓代有其人,世传其美。

礼仪的最高境界当然是祭天,而祭天最隆重之举则是封禅。汉武帝文治武功既成,欲告天祭地,以炫百世无有之功烈,而董仲舒诸儒不知其仪,得司马相如临死前所草《封禅书》而成其事,其书自今犹保存在《史记》之中。蜀人《礼》学论著,应以此为最早也最巨。其后则有:东汉景鸾撰《礼略》,三国王长文撰《约礼》,晋杜龚撰《丧纪礼式》,虽然今已不传,但顾名思义,都是“镕铸礼经,自成一家言”^[17]。甚至其后唐峨眉人仲子陵撰《五服图》10卷,取丧礼所服缌麻、大功、期、齐衰、斩衰五种服制,绘成图解,贞元九年(793)上于朝,其实质仍然是主于实用的。

汉人之传《春秋》,初期唯有《公羊》学,齐胡毋子都、公孙弘、赵董仲舒,皆传《公羊》学。后来衍为颜氏、严氏,俱立于学官,是为《春秋》今文学。宣帝时,以其祖故戾太子喜《穀梁》,于是议立《穀梁》博士。至成帝时,刘歆于整理群书时得古文《左氏春秋》,以为事富而辞艳,请立《左传》于学,今文诸博士不肯置对,歆撰《移太常博士书》以让之,从而引发《春秋》今古文之争。

蜀中传《春秋》大致与中原同步。史称庐江人

文翁“少好学,通《春秋》”,“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遣张叔等东受“七经”,还教吏民,《春秋》必在其中,这也许是《春秋》传入巴蜀的最早记录。《华阳国志》说,张叔从博士受经,撰《春秋章句》,此乃蜀人有《春秋》学著作之始。常璩还载:“《穀梁传》首叙曰:‘成帝时议立三传博士,巴郡胥君安独驳《左传》不祖圣人。’”^{[5]卷一〇下}这是迄今可考的巴蜀学人最早的《春秋》学说。汉哀帝时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批驳当时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2]卷三十六},诸博士之说,盖亦祖于胥君安也。

《后汉书·张霸传》说:“霸以樊儵删《严氏春秋》犹多繁辞,乃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15]卷三十六}两《汉书》凡言“某氏学”者,皆学派师法也。张霸是史书明确记载蜀人在《春秋》学上形成学派的第一人。

两汉三国时期,蜀中治《春秋》者,据吴福连《拟四川艺文志》考述:“而治《公羊》者,又有张楷、刘宠、张裔、王化;李譔著《左氏指归》,黄容著《左传抄》,又有尹默、李宓,皆治《左传》;而寿良、王长文,则‘三传’并治。此汉晋之最有名者也。”^[17]然而,这一时期,蜀中史学发达,而经学稍衰,《春秋》文献除上述所举者外,仅有杨终《春秋外传》12篇、《春秋章句》15万言^{[15]卷四十八《杨终传》},王长文《春秋三传》13篇^{[5]卷一一},黄容《左传抄》数十篇^{[5]卷一一}。

《论语》本文翁化蜀的教材“七经”之一,举凡巴蜀学人之业儒者必为研修,而有《论语》著述者,有汉末谯周《论语注》,其余多仿效《论语》之作。《法言》13篇是扬雄的哲学著作,体例效仿《论语》,和他的《太玄》效仿《周易》一样,是经学史上最早的拟经之作。班固在《汉书·扬雄传》中详述《法言》的写作目的和内容:“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氏诋訾圣人……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2]卷八十七《扬雄传》}《法言》不特语言取法《论语》,其篇章得名亦仿《论语》取其首章首句为称。北宋司马光撰《读玄》倍加推崇:“孔子既没,知圣人之道者,非扬子而谁与?孟、荀殆不足拟,况其余乎?”蜀汉犍为太守王颀之子王长文,亦仿《论语》作《无名子》12篇。蜀学的仿经传统甚至还影响了入蜀人士,如隋末王通,曾为蜀王侍读、蜀司户参军,也曾仿蜀儒故智,遍拟群经及《论语》,而作《续六经》及《中说》^⑤。

《孝经》是儒家重要经典,汉人称孔子有“吾志

在《春秋》,行在《孝经》”之言;后人亦有“圣人之行莫先于孝,圣人之书莫先于《孝经》”(范祖禹说)之论。自汉代以来,统治者倡言“以孝治天下”,故《孝经》之书童而习之,长而能诵。自秦汉以来,巴蜀人士重德兴孝,早成传统。古代巴蜀之忠臣孝子,固不绝书于历代史志;而耆儒硕学在研习儒家《五经》同时,对《孝经》也是精研恪遵,足以名家。《孝经》亦文翁化蜀的教材“七经”之一,早在西汉文、景之时,在文翁、张宽等人的倡导下,提倡德孝的经典《孝经》随孔子《五经》和《论语》传入蜀中,成为造就巴蜀士人、重树巴蜀民风的重要经典,巴蜀学人从立德、立言两个方面,共同丰富和发展了祖国文化的“孝学”内容。《华阳国志》称:“严遵……常卜筮于市,假著龟以教,与人子卜教以孝,与人弟卜教以悌,与人臣卜教以忠。于是风移俗易,上下慈和。”^[5]又:“郑子真,褒中人也。玄静守道,履至德之行,乃其人也。教曰:‘忠孝爱敬,天下之至行也。神中五征,帝王之要道也。’成帝元舅大将军王凤备礼聘之不应,家谷口,世号谷口子真(神中、五征未详其义)。”^[5]无处不体现出鲜明的“德孝”特色。巴蜀古代的《孝经》学成就与其他经学成就一样,也取得了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突出成绩。然而,由于时代久远,巴蜀古代文献大量亡佚,清嘉庆重修《四川通志》著录古代蜀人“孝经学”著作仅有10种,而始记隋何妥《孝经义疏》三卷,其实不确。如张宽等人之教习《七经》,其中就有《孝经》,其时间早在文、景之世;严君平“教人子以孝,孝人弟以悌”,郑子真能总结出“忠孝爱敬”、“神中五征”等“至行”“要道”,当然也得力于《孝经》传入,时间都在成、哀之间,远较隋代为早。

五 独步学林的“小学”与“讖纬学”

小学诸书,粗可分成启蒙识字系列、说文解字系列、方言别语系列、音韵训诂系列等。在上述四大系列中,蜀人皆有良好表现。

据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西汉时期识字之书有六:一是秦代所传《仓颉》3篇,有文字3300字;二是武帝时司马相如《凡将》;三是元帝时史游《急就》;四是成帝时李长《元尚》(以上《急就》和《元尚》二书文字不出《仓颉》篇,只有司马相如《凡将》有超过,而且没有重复字);五是扬雄《训纂》,这是《仓颉》三篇的续篇,其文字来源是:平帝时曾“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2]《艺文志》},扬

雄再从他们所记的文字中“取其有用者”，编录而成；六是扬雄《仓颉训纂》，系扬雄对原《仓颉》中重复之字进行抽换而编成，东汉时班固有再续《仓颉训纂》之作。至此，六经群书的文字盖无遗漏了。汉代最早的小学著作是司马相如《凡将》，收字最多的小学著作也是司马相如《凡将》，还有扬雄《训纂》、《仓颉训纂》。吴福连赞曰：“《凡将》、《训纂》，蜀儒小学，冠冕海内。”^[17]

扬雄不仅有识字韵语《训纂》，还有汇释古今中外方言的语言学巨著《方言》，而这些又是他从林闾翁孺、严遵两位先辈那里继承来的，渊源有自。扬雄说：“先代輶轩之使奏籍之书，皆藏于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遗弃不见之者，独蜀人有严君平、临邛林闾翁孺者，深好训诂，犹见輶轩之使所奏言，翁孺与雄外家牵连之亲，又君平过误，有以私遇，少而与雄也。君平财有千言耳。”^[18]卷一三他于是依据严氏、林闾所藏底本，增补而成第一部方言辞典《方言》，开辟了中国区域语言研究之先河，与《尔雅》及后来的《说文解字》并立为训诂学三大基本经典。

《尔雅》是汇集“五经”训诂资料的书，在中国训诂学史上影响甚巨，地位比于经典。张揖《进广雅表》称：“周公著《尔雅》一篇。今俗所传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孙通所补，或言沛郡梁文所考。”^[13]卷四〇其源起是非常悠远的。《隋书·经籍志》引《七录》“韃为文学《尔雅注》三卷”；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亦著录“韃为文学《注》三卷”，并自注：“一云韃为郡文学卒史臣舍人，汉武帝时待诏。阙中卷。”陆说韃为文学是汉武帝时人，他作的注就是《尔雅》的最早注本。汉代蜀人在识字、方言、训诂三个系统都有著述，而且都具有开创性。吴福连说：“蜀之小学，最著于汉矣。”^[17]实不虚美。

两汉讖纬学依附于经学而行，兴起于新莽，盛行于东汉。至郑玄遍注群经和讖纬文献，经纬互证，于是讖纬学与经学难分彼此，讖纬学成为经学之一部分。扬雄曾受授讖纬学：“〔王〕莽既以符命自立……欲绝其原以神前事，而〔甄〕丰子寻、〔刘〕歆子棻复献之。……时〔扬〕雄校书天禄阁上，治狱使者来，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从阁上自投下，几死……有诏勿问。然京师为之语曰：‘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2]卷八十七《扬雄传》似乎扬雄与讖纬学也有牵连，被时人目为“符命”的制作者。至东汉，巴蜀讖纬学盛行，巴蜀大儒多通晓讖纬，好言灾

异。翟酺“尤善图纬、天文、历算……著《援神》、《钩命》解诂十二篇”；景鸾“兼受《河》、《洛》图纬，作《易说》及《诗解》，文句兼取《河》、《洛》，以类相从，名为《交集》，……又抄风角杂书，列其占验，作《兴道》一篇，……数上书陈救灾变之术”；杨由“少习易，并七政、元气、风云占候”；段翳“习《易经》，明风角”；赵典“学孔子七经、河图、洛书、内外艺术，靡不贯综，受业者百有余人”，“朝廷每有灾异疑议，辄咨问之。典据经正对，无所曲折”^[15]卷八十二上《段翳传》。

不仅巴蜀多讖纬学者，而且形成广汉杨门之学和巴西谯氏之学两大讖纬学派。东汉初年，杨仲续之孙杨春卿“善图讖”，春卿子杨统“朝廷灾异，多以访之”，曾以“九世之运”说言光武中兴事，著《内讖》二卷。统子杨厚尤擅讖纬学，厚弟子任安精通经学而又穷极杨门讖纬学，杨厚曾预言“汉三百五十年之厄”；其另一弟子董扶则劝太常刘焉入蜀：“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任安弟子何宗用杨统“九世之运”讖纬说，劝进刘备称帝。此为杨门之讖纬学。西汉末年，以善说《易》、《春秋》的谯玄喜言图讖，《一统记》载，东汉末年，其后人谯岍“治《尚书》，兼通诸经及图纬”；其子谯周“有董、扬之规”，为杜琼唯一真传弟子，而杜琼为得任安真传的杨门讖纬学者，故谯周兼得讖纬学两学派精髓；谯周又拜“蜀之仲尼”秦宓为师，其讖纬学著作有《讖记》、《丧服图》、《法训》等；汉末，杨厚弟子周舒解释《春秋讖》中“代汉者，当涂高”为“当涂高者，魏也”，谯周则以讖纬劝后主降魏：“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此为谯氏之讖纬学^[19]。

六 结论

汉代巴蜀经学兴起于文景之世，文翁奖励儒学教育，开巴蜀士子京师游学之风气，又领先全国以“七经”（以《五经》加《论语》、《孝经》）造士，于是七经之学盛行巴蜀，经学人才辈出。此外，巴蜀学者对汉代经学影响很大，如景武时期张宽撰《春秋章句》，是为汉人为《春秋》经章句之学的第一人。汉宣帝时赵宾“说《易》巧慧，《易》家不能难”，曾经影响《易》师孟喜。元成时期，严遵精研《易》道，耽于《老》《庄》，居市卜筮，“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悌，与人臣言依于忠”，有《易》著多种，其《老子指归》首开“《易》《老》会通、儒道融合”之先河。哀平新莽之时，扬雄仿《周易》著《太玄》、仿《论语》著

《法言》,肇开中国儒者仿经拟圣之习。东汉章帝时,杨终建言促成白虎观会议,并参与论考五经同异。汉顺帝时,翟酺上书建言重修太学,曾促成太学重光和经学再兴。所有这些都是当时蜀人治学活动的闪光点,也是蜀学对儒学发展的重要贡献。

据缪荃孙《蜀两汉经师考》统计,汉代巴蜀经学人物文献可考者 65 人^[20]。两汉巴蜀经学以《易》学、“小学”最盛,《诗》、《书》之学渊源有自,而《礼》、《春秋》、《孝经》、《论语》之学胜义迭出,时有可观。《后汉书·儒林传》列巴蜀经学人物六人:任安习《孟氏易》,任末、景鸾习《齐诗》,杜抚、杨仁习《韩诗》,董钧习《庆氏礼》。汉代巴蜀学者任经学博士者三人。董钧“永平初,为博士。时草创五郊祭祀,及宗庙礼乐,威仪章服辄令钧参议,多见从用,当世成为通儒”^[15]卷七十九《儒林列传》;另两人为成都人罗衍

(字伯纪)和 杨班(字仲桓)^[5]卷十一《益梁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目录》。杨仁、任安、董扶曾推辞博士任命^[21]。汉代巴蜀多忠孝节烈者,“忠臣孝子,烈士贞女,不胜咏述”^[5]卷三《蜀志》,虽无《孝经》学文献记载可述,巴蜀《孝经》学之盛行普及可知。巴蜀学者不满当时繁琐经学背离孔子思想,自扬雄开始多有拟经之作,成为汉代巴蜀经学的一大特色。

汉代巴蜀亦多通经致用之士。除上文所述专经著述之外,蜀地经师兼有通经之作,关涉政治世运与经术教化,如譙周《五经论》、《五经然否论》、《五教志》等。自司马相如至于秦宓以下,汉代蜀士多因通经致用而誉满天下。汉末巴蜀经学与巴蜀地域政治经济命运密切相关,于是以杨门之学和譙氏之学为代表的通经致用之学和讖纬学大兴。

注释:

①关于汉唐巴蜀《易》学,可参看:金生杨《汉唐巴蜀易学研究》,巴蜀书社 2007 年版。

②张行成《易通变》卷四〇“四易本原”云:“西汉扬子云作《太玄》,义取于《连山》;后周卫元嵩作《元包》,义取于《归藏》。于是二易,世亦有书。”

③景氏书,《经义考》、《通志》、《拟四川艺文志》皆作《易说》,不确。其书又作《交集》、《奥集》。《北堂书钞》卷九六引《益部耆旧传》云:“景鸾字汉伯,少随师学,经七州之地,能理《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作《易》说及《诗》解,文句兼取《河》《洛》,以类相从,名为《交集》。又撰《礼》内外记,号曰《礼略》。”《后汉书》本传同。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九一引《益部耆旧传》作《奥集》。朱彝尊《经义考》卷八两存之。盖“奥”字古文作“交”,与“交”形近,遂误。《奥集》兼《易》与《诗》而言,“易说”乃概称,非正式书名。

④李氏书,《经义考》、《通志》、《拟四川艺文志》皆作《古文易》,不确。《三国志》本传云:“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古文”、“指归”具兼包《易》、《书》、《诗》、《礼》、《太玄》而言。

⑤杜淹《文中子世家》说,文中子忧“道之不行”,“退志其道”,“乃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九年而‘六经’大就。…隋季,文中子之教兴于河汾,雍雍如也。大业十年,尚书召署蜀郡司户,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国子博士征,并不至。十三年,江都难作”云云,似乎王通“续‘六经’”在大业九年(613),而署蜀职乃在十年(614)。薛收《文中子墓碣》载:“十八举本州岛秀才,射策高第。十九除蜀州司户,辞不就列。大业伊始,君子道消,……时年二十二矣。以为卷怀不可以垂训,……乃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象”云云,是其“续‘六经’”在署蜀职之后。大业初,王通 22 岁,其生当开皇四年(584),19 岁署蜀王府职,在仁寿二年(602)。其大业九年“续‘六经’”,实在署蜀职之后。

参考文献:

- [1] 战国策注释[M].何建章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96.
- [2]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3] 张震泽.扬雄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4] (三国)陈寿.三国志[M].(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8.
- [5] (晋)常璩.华阳国志[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 [6]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M]//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7] (宋)魏了翁.鹤山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8] (宋)袁说友.成都文类[M].北京:中华书局,2012.
- [9] (清)顾藹吉.隶辨[M].北京:中华书局,2003.

- [10] (宋)洪适.隶释·隶续[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1] (汉)司马相如.汉司马相如集[G]//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12] (汉)严君平.老子指归[M]//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13] (清)永瑆,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14] (清)吴翊寅.易汉学考[M]//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15]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6] (宋)青阳梦炎.春秋经筌序[M]//赵鹏飞.春秋经筌//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17] 吴福连.拟四川艺文志[M]//尊经书院初集.光绪成都刻本.
- [18] 法言义疏[M].汪荣宝注疏.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 [19] 陈国灿.略论汉魏时期的巴蜀学派[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4).
- [20] 缪荃孙.蜀两汉经师考[M]//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21] 杨更兴.两汉巴蜀经学略论[J].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6,(6).

A Study on Confucian Classics in Bashu in the Han Dynasty

SHU Da-gang¹, WU Long-can²

(1.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2. Sichuan Thinkers Research Center, Yibin University, Yibin, Sichuan 644000,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n confucian classics in Bashu in the Han dynasty starts between Wen and Jing period, as Wen Weng put a premium on confucian education with seven confucian classics as the canon. As a result, the study on seven confucian classics boomed in Ba and Shu, with Yi learning and ancient Chinese linguistics as the most popular. Being critical of breaching real meaning of Confucius, scholars in Bashu, such as Yan Zun and Yang Xiong, created a unique characteristic in the study on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late period of the Han dynasty, the academic in Bashu was tightly associated with politics and theology of Yang school and Qiao school became the representatives.

Key words: Shu learning; study on confucian classics; Bashu; the Han dynasty

[责任编辑:苏雪梅]